

評介「鄭觀應與孫逸仙」

黃克武評

「鄭觀應與孫逸仙」一文為鍾基瑞先生(Dr. Key-ray Chong)之博士論文 *The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Sun Yat-sen's Nationalistic Ideology as Expressed in the San Min*

Chu I 中之第三章，該書出版於一九六七年，是一篇二十年前的舊作。全書探討梁啟超、鄭觀應、何啟等人之思想與中山先生之關係，其中有關梁啟超、何啟與中山先生之關係的兩章已經經由前人譯介，發表於「中山社會科學譯粹」一卷四期和二卷二期，現唐玉禮小姐又完成此章之翻譯，使讀者對全書之主體部分有較完整的了解，進而認識中山先生的思想淵源，實具重要意義。以下筆者首先對該文之內容與方法作一簡述，探討鍾氏在此章中問了那些問題，並透過何種論證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其次再提供一些補充意見；最後則對該文作一批評，希望有助於讀者對此問題的思考。

據作者表示該文的目的在討論鄭觀應對中山先生一八九四年上李鴻章陳救國大計一文之影響，首先作者反駁吳相湘所謂鄭氏「盛世危言」中「農功篇」係出自中山先生之手筆的說法，認為此文為鄭氏的作品。作者因為無法找到直接證據，證明鄭、孫二氏的交往狀況及思想上的相互關係，因此他間接地從兩人的思想

內涵著手，將鄭氏的「盛世危言」和孫氏的「上李鴻章陳救國大計畫」作一比較。作者發現兩文不但在用字、語氣、風格上極為相似，且孫氏的四大綱領「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都可以在盛書之中找到；其次作者又分別從農業改革、人才培育、商務、民族主義、民主等方面仔細比對鄭、孫二人之主張，發現兩人的論點極為相似，而斷言孫氏的同鄉前輩——鄭觀應，對其早期的思想有深遠的影響。

本文的基本論點應無疑問，中山先生早年思想確受鄭氏「盛世危言」等書之影響，此點胡秋原先生在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所撰「鄭觀應生平及其思想」（『盛世危言』重印緣引，後收入周陽山等編「晚清思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九年）一文即已指出。胡氏表示孫先生在年輕時代顯然十分熟悉鄭氏的文字，所以與中會宣言文字與「盛世危言」文字，頗多類似之處。而本文作者更進一步地比對這些類似的文字，給予讀者一個十分清晰的印象，這是這篇文章的貢獻。

有關鄭、孫二人的交往狀況，作者在文中並沒有引用確定的史料，只是推測「二氏在一八九二年時彼此認識」，至一八九四年孫氏上書李鴻章，在往天津的途中，於上海與鄭氏晤面。關於

這方面，中共學者夏東元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鄭觀應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提供了一些可資參考的意見：

鄭觀應與孫中山同為香山縣人，翠亨村和雍陌鄉相距僅三十里，鄭觀應是早已馳名宇內的洋務前輩，蜚聲中外的進步思想家與實業經營家。一八九〇年前後孫中山經常往來於香港、澳門，同閑居於澳門的鄭觀應時有交往。他們不僅在富強救國問題上基本同調，且在中西醫學方面也有共同語言（作者在附註中提到鄭氏在澳門輯有「中外衛生要旨」一書，一八九一年刊行）。（頁一〇九）

此外作者在盛宣懷檔案中找到光緒二十年五月某日，「鄭觀應致盛宣懷函」，信中鄭氏為中山先生求見李鴻章一事函請盛氏協助推荐，信中鄭氏對中山先生推崇備至，此信與本文關係密切，可惜鍾基瑞先生當時沒有看到這條史料，茲轉錄於下以供參考：

杏翁仁兄方伯大人閣下：敬肅者，敝邑有孫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國醫士，留心西學，有志農桑生植之術。欲遊歷法國，講求養蠶之法，及遊西北省履勘荒曠之區，招人開墾，免致華工受困於外洋。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茲欲北遊津門，上書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蘊。弟特敢以尺函為介，俾其叩謁台端，尚祈進而教之，則同深紉佩矣。專肅，敬請助綏。惟祈鈞鑒，不備。教小弟制鄭官應頓首。（頁一〇）

由上文中可見鄭氏將中山先生引為「富強救國」的同道，並給予熱情的支持。由此亦可反映本文作者對鄭、孫二氏之關係的敘述

評介「鄭觀應與孫逸仙」

是有其根據的。

不過本文也有一些美中不足的缺點，茲分述如下：

1. 關於鄭觀應的生卒，文中所列為一八四六—一九？，此點應詳加考證，不可輕易帶過。據胡秋原先生的大作其生卒為一八四一—一九二三；而范振乾先生的論文則作一八四二—一九二一，由此可見各家所見差異甚大。以一篇博士論文來說，作者應有根據資料考證其生卒年代。（范氏的論文為「鄭觀應的改革理論（一八六〇—一九一一）」，民國六十六年台大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2. 作者對鄭觀應在「上海機器織布局」之任期敘述似有錯誤。作者引用 Fairbank 等人所編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說鄭氏被任命為該局的第一任經理，擔任到盛宣懷於一八八七年接管該廠。根據陳慈玉小姐的近代「上海機器織布局——設立背景、經營方針及其它有關問題的檢討」（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六年八月舉辦之「清季自強活動研討會」），鄭觀應於一八八四年三月，因挪用公款事發，而突然辭職；此時官務主持人龔壽圖會邀請盛宣懷接辦，被拒；一直到一八九三年該局火災之後，盛宣懷才在李鴻章的命令下接管局務。

3. 作者從頁一二八至一三一（原書）花了很長的篇幅敘述容闈的生平與思想，此段與文章主脈沒有必要的關連，予人有離題之感。

4. 作者在頁一六七（原書）表示鄭氏著作中常用「民生」和「國計民生」兩詞，而兩者均可譯為「people's livelihood」。國

計二字意指國家的經濟，語出『荀子』「富國」：「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國計與民生實指不同範疇，故「國計民生」與「民生」並不相同。事實上國計民生一詞的使用，反映出在傳統中國強調一個政策的施行必須平衡國家與人民雙方面的利益。（此觀念的分析見 Thomas Metzger,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Bureaucracy*, 頁五六。）思想史的研究應注意細微的差異，不可隨意混淆。而作者有意透過如此的翻譯說明鄭氏思想與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關連，也是十分牽強。

5. 最後對於本章的研究方法筆者也有所質疑，作者的論證方式可簡述為：鄭氏著作中有甲觀點，孫氏著作中也有與甲觀點類似的話，而鄭氏較孫氏望高年長，兩人又是同鄉，所以可以推論鄭氏影響孫氏。這種推論方式十分危險，因為兩人在思想上有「點的類似」，不一定互相有影響。從理論上來說近年來一些歐洲學者對 Arthur Lovejoy 所謂 *History of Idea* 的批評，即針對此點，因為同樣一個論點表面上可能一模一樣，可是實際上是放在不同的思想脈絡之中，抽離其思想脈絡而加以比較，並認為兩者之間有連續性，是相當危險的推論，例如 A B 兩者可能是同受 C 的影響，而 A B 之間並無關連。在邏輯上 A B 之間的關係有無數種其它的「可能」。作者在心理上先假定鄭氏影響孫氏，然後去史料中找證據，因此眼中所見盡是相似點，而所提的證據不無可疑之處。以下列舉數點：

(1) 作者以鄭氏在盛書中的自序和孫氏上李鴻章書的開頭部分均為第一人稱之語調，而認為孫氏似忠實地遵循鄭氏在盛書中的

語氣，此點證據太抽象而不夠充分。

(2) 頁一四三作者提到一個更有力的證據 (cogent evidence) 是：據說，孫氏會親口向戴季陶透露，在他一八九四年上李鴻章書中提出的部分建議，係擷取鄭氏盛書中的一些概念。而註解中引用的是近人周弘然在『大陸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此種轉引的證據沒有很強的說服力。而筆者查對周氏原文，他根據「吳稚暉先生致鄒飄萍函」及戴季陶「孫中山先生著作及演講紀錄要目」，指出據戴季陶先生說：前年孫先生還親口告訴他（戴自稱），『盛世危言』裏也採用了他的兩篇稿子。此種說法與本文作者的引述有很大的出入。

(3) 頁一六九作者提到孫氏在一八七九年往夏威夷搭乘「鐵皮船」，然後他立刻聯想到鄭觀應的『南遊日記』也談到搭「鐵皮船」，所以他表示，這給人孫氏相當熟悉鄭氏『南遊日記』的一個印象。這種推論太過牽強。

(4) 作者認為興中會的四大綱領是孫氏上李鴻章的再版，也是鄭氏觀點的再生。個人認為作者似乎有意地放大了鄭氏對孫氏的影響，因為作者所談到的各種類似點是自強運動以來經世思想家所反覆討論的一些觀點，即以重視商務一項來說，當時提出商戰觀念和重商思想的人非常的多，王爾敏先生和筆者都會撰文加以檢討，其它農業改革、人才培育、政治改革等項也是如此，因此我個人認為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的政治思想是源自當時整個時代氣氛的影響，或者用 Carl Becker 的話來說是源自當時的 *climate of opinion*，不一定完全來自鄭氏的觀點。①當然鄭氏或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角色，但研究時不應假設兩者有直接的思想上的

的連續性。作者可針對其內涵分析兩人之異同，然後讀者可以了解鄭、孫兩人之主張在那些部分相同，在那些部分互異。在相同點方面應系統地探討，例如目標是否相同，方法是否相同？而其背後是否有同樣的對知識的態度和對歷史的理解？舉例來說兩人似乎均已採取科學的宇宙觀，反對迷信，主張對環境的理性控制，此點與傳統思想已有不同；但另一方面傳統的「三代史觀」，認為三代是理想的治世，却仍然存在兩人思想之中，這些思想的預設（premise）都值得進一步思索。而兩人思想的相異點也不能忽略，作者在這方面著墨甚少，十分可惜，就文中提到的史料來說，例如孫氏將鐵路比為國之命脈，鄭氏則將海運、商務比為國之命脈，此點反映兩人對發展重點的不同構想，而這樣的差異是如何產生的？又有何種影響？譬如說鄭氏的觀點是否與他擔任太古洋行買辦之經歷有關？而孫氏的觀點是否又使他後來卸任大總統後擔任全國鐵路督辦？總之，兩人的相異點必須特別重視，因為後來兩人走向完全不同的路子，中山先生走向革命，鄭氏却相信修仙，追求「金丹七返九還之妙」，這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是否從早期思想中可以透露出來，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以上是個人閱讀本文後的一些感想，所提的意見不一定正確，提供讀者參考。（本文之評介主要針對該文之內容，翻譯上的問題在此不予討論）

註 釋

①事實上周弘然先生的「國父上李鴻章書之時代背景」，載『大陸雜誌』第二三卷五期（民國五十年），也持類似看法，他表示「總上以觀

，國父那時所處的境況，是個維新改革的時代，而直接、間接影響國父上書的何啟、鄭觀應、王韜、馮桂芬等人，均為一時之彥；這些人都主張英國式的君憲制度，國父在大學時代受英國教育，自然與這些人有不期而合者」，見頁一五九。

（評者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